反共文藝

• 司陽 •

陳若曦的「尹縣長」一書，從在報紙副刊發表到出版，掀起了一股閱讀和討論的熱潮。不但來自大陸的中老年人愛讀，難得的是，青年人也愛讀。暑假期間接觸幾位由美回國渡假的留學生，閒談中，知道這本反共小說同樣受到留學生的重視和歡迎。陳若曦飛蛾撲火，七年的慘痛感受，使其大澈大悟，了解了共匪殘民以逞的本來面目。「尹縣長」一書雖僅短短十餘萬字，但透過陳若曦細膩而深入的描寫，讓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再一次明白共匪滅絕人性的種種事實，而堅定了反共的意志。這對陳若曦來說，稱得上是「痛苦的代價」了。

「尹縣長」的出版，使我想到了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件事——反共文藝。

政府倡導反共文藝，從三十八年算起，也已有了二十八年的時間。這期間，從早期由張道藩先生所領導的「文獎會」到後來發起的規模龐大的「國軍新文藝運動」，都是以鼓勵反共文藝創作爲目的。不論是「文獎會」也好，「國軍新文藝運動」也好，工作的推展都很積極，徵文的獎金也很高，這兩個組織的辛勤耕耘，以及他們爲反共文藝所作的努力，是值得稱道的。但是，經過了二十八年漫長的時間，我們究竟產生了多少優秀的反共作品？答案是很使人失望的。

是我們的作家不肯寫反共的作品嗎？根據我的了解，作家中絕大多數都有堅定的反共意志，也極願意以反共作爲寫作的題材。他們沒有寫的原因，是因爲他們對於共匪缺乏實質上的了解。不「了解」就不能激起「感情」，而「感情」是文藝創作的元素。技巧可以磨練，感情却是絕對做不得假的。

在文獎會期間（特別是早期），公私營報刊所發表的作品，大多以反共爲題材，那是因爲政府遷臺伊始，本省作家還沒有創作能力，而大陸來臺的作家，則幾乎都遭受過共匪的迫害，因此，反共對他們來說，是一種不吐不快的感情，也是一種活生生的經驗，即使政府不提倡文藝，相信照樣有許多反共作品產生。端木方和潘人木是那時期最受識的作家，端木方的「疤勛章」、「青苗」，潘人木的「如夢記」、「漣漪表妹」，都有極高的成就。撇開他們寫作的造詣不論，他們能充分把握故事的社會背景，進而使人物與欲表達的時空相結合，則是絕對的事實。

稍後，則是姜貴的「旋風」和「重陽」，這是兩部極重要的反共作品，但同樣也是由於姜貴對欲表達的題材、人物，有深切的了解。特別是「旋風」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體認出，姜貴對於其中的人物，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張愛玲的「秧歌」和「赤地之戀」，同是反共作品，但是後者的成就，顯然比不上前者，其中原因，可以斷言是因爲「秧歌」的社會背景、人物，是張愛玲所熟悉的，而「赤地之戀」的故事（尤其是韓戰部分）則使人懷疑是借助於資料。

回過頭來再說陳若曦。假如她不去大陸生活七年，即使她的反共意志堅定如鐵，或者讓她接受反共教育，她一樣寫不出「尹縣長」這麼扣人心弦的作品。陳若曦曾在前不久發表的一篇短文中，表示「尹縣長」一書中的人物，都是她所熟悉的，那也就是說，書中人物的可悲遭遇，在她未寫成故事之前，已使她感動，在感情上，他們猶如她的親人，她是在爲這些「親人」「鳴不平

」。這種感情是多麼深沉，再配合陳若曦的寫作造詣，「尹縣長」的成功，幾乎是必然的！

我舉出以上幾部成功的反共作品爲例，目的只是在說明一個淺顯的道理——文藝作品中絕對不能缺少感情，而感情又必須建立在「了解」上——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作家，對共匪暴政不是不了解，但這種了解還不足以用來作爲寫作的題材。這就是爲什麼很多人都有寫反共作品的心，却總不能成爲事實；或者，寫出來只是八股口號，不能像「尹縣長」一樣地使人感動。

政府的有關單位，爲了便於作家寫作反共的作品，曾多次表示願意提供所需要的資料。我不敢說這種服務完全沒有意義，可是却敢斷言，僅憑資料，是絕對寫不出好作品出來的。我再强調，作品中最重要的是感情，如何使我們的作家在既有的反共意志上再培養「反共的感情」，政府是否可以在這個題目上動動腦筋？

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
第三隻眼

全省各大書局均售
第三隻眼

每册35元
第三隻眼